

WO ZHIDAO SHEN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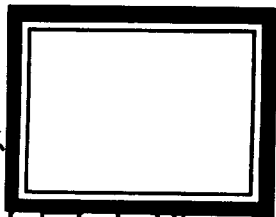
我知道什么？

1900年以来的法国小说

〔法〕皮埃尔·德·布瓦岱弗尔 著

商务印书馆

我知道什么



1900 年以来的法国小说

〔法〕皮埃尔·德·布瓦岱弗尔 著

陆亚东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8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00年以来的法国小说/(法)布瓦岱弗尔著;陆亚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我知道什么?》丛书)
ISBN 7-100-02492-7

I.19… II.①布… ②陆… III.小说-文学研究-法国-现代 IV.I565.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9559 号

我知道什么?

1900年以来的法国小说

[法] 皮埃尔·德·布瓦岱弗尔 著

陆亚东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ISBN7-100-02492-7/Z·22

1998年1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32

199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81 千

印数 3000 册

印张 5 3/8

定价:7.50 元

《我知道什么?》丛书

出版说明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 1941 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 3000 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 40 多种文字出版。

“我知道什么?”原是 16 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 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

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5年5月

目 录

告读者	1
第一章 1900 年的法国小说	5
第二章 1910 年的一代	22
第三章 20 年代	35
第四章 30 年代	50
第五章 战争、占领、解放……从 40 年代到 50 年代	63
第六章 50 年代	76
第七章 “新小说”	96
第八章 60 年代	112
第九章 法语国家的小说	127
第十章 70 年代	137
第十一章 旧与新:用作结束语	147
注释	160

告 读 者

哪怕是只限于“今日作家”⁽¹⁾，想用 128 页的篇幅使人对文学的全貌有一个了解是不容易的。本书涉及了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小说，从左拉、于斯曼和布尔热到 1950 年前后出生的作家。这次研究以一些已经闻名的作品为限，希望大家不要因此而抱怨我。

没有任何事物比文学史过时得更快，因为这种最有雄心的综合性事物常常是最为脆弱的。勒内·拉卢的《我知道什么？》丛书划分出“个性小说”、“外省小说”、“社会小说”、“全球小说”、“幻想小说”等等，在一个各种文学种类交错结合并要求小说家去承担包括文学、评论和诗歌的所有职能的时代中，这样的分类就变得不易为人理解。像蒂博代所做的那样，确定一个年表，一代一代地来论述那些小说家，会显得更易理解。

当然，小说家们的年龄不一，踏上文学之路的方式也不同。但是，小说家们和画家们一样，即使是那些对所处时代持否定态度的人（如：塞利纳或让·热

内),也还是表现了他们那个时代。

*

*

*

每个谈论小说的作品都是以寻求一种定义开始。然而任何一种定义都不能令人满意。小说不仅是“一个时代的镜子”(勒内·拉卢),而且已经成为一个大熔炉,“西方人将他们所创造的一切、他们所无法预料的一切,即他们的命运熔于”这个大熔炉之中(R.-M.阿尔贝雷)。一种长期被奉为经典的划分方法将“个性小说”(或姻缘小说,这已经不再是一回事了)与“社会小说”看成两大相对立的小说,德·拉法耶特夫人和本杰明·康斯坦为一方面的代表,巴尔扎克和左拉为另一方面的代表,但这两方是相互渗透的。

另外,我认为小说如同一部供阅读的机器,是“一个像雪茄烟和茴香酒一样可消费的产品”^[2]。这一定义更显示了小说的虚构特点——虚构使我们忘记了现实的世界和所处的时代,置身于一些虚构人物的另一种生活之中——,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创作,因为创作会发人深思。

一方面是消遣和娱乐,另一方面是内心反省和价值取向。实际上,那些巨著——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鲁斯特的作品——是合乎两种定义的。阿尔封斯·都德早就指出(1876年论及巴尔扎克)一

种观点文学进入了小说，这在 17 和 18 世纪的文学体裁中是没有的，因为小说吸收了不久以前还是在“杂文”和评论中所表达的东西。随后，小说继续扩大范围，吸收最为广泛的资料，包括精神或社会事件、刑侦调查、各行各业和旅行游记。

同时，还兴起了一种引起评论界普遍关注的探索小说或创新小说。当然，通俗小说——古老意义上的“传奇小说”——是一直存在的，今天又得到了电影和电视的发扬。

文学恐怖主义力图使我们相信小说家们不再有权进行虚构。因此罗兰·巴特祝贺阿兰·罗伯-格利耶杀死“人物”结束了那种“刻画人物内心”的小说。已经有 30 年了，旧小说一直未遭淘汰。小说由于其极端的可塑性确实在不断翻新，从这个意义出发，拉卢将它称为无限制的文学体裁。

阿尔贝·加缪更为苛求，想象的确不是他的专长，他写小说是“智力不断超越的高级训练”。然而，普鲁斯特与居伊·德·卡尔，圣·安东尼奥与巴尔达米却能共处……

大量的作品，虽然各不相同，即使是体裁差别很大的作品，大致上还算是和平共处，这被看作是一种有活力的表现。但怎样进行选择呢？朗博和瓦里荣——两位青年评论家——在 1923 年对小说的“年轻

作者”进行了统计，在“未来的小说家”中列举的有：贝罗、比约泰、布里扬、埃斯科利埃、乔治·伊马恩、佩罗雄、瓦里约和泰里弗。一个冗长的名单！今天，这些作者已经被人遗忘，但是阿拉贡、莫里亚克、蒙泰朗、朱利安·格林——他们曾被两位统计者所忽略，却名声大振——和早已开始写作但几乎还未发表什么作品的贝尔纳诺、塞利纳和吉奥诺一样出名。这大概会促使我们谦虚一点！

你们将要看到的名单虽然可以算是最佳挑选，却不是一个荣誉榜。想要得到一个更为齐全的资料和更为广博的分析的人需要参阅其它著作^[3]。这本小书只涉及那些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作家。起码 70 年代以前的作家是这样的，因为 70 年代的作家还需要选择。但是，其它的著作肯定是有价值的，可能会更加持久。历史将会承认自己的产物。

第一章 1900 年的法国小说

1900 年是博览会喧闹的一年,这一年资产阶级社会还是自豪与自信的。第三共和国处在鼎盛时期,俄罗斯同盟赋予它一个体面的印记,它的各种机构运行良好,曾一度使它受到动摇的德雷福斯事件加速了左派运动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一种选举力量的时候,在天主教并没有因利奥十三——劝告天主教徒归顺——曾企图将天主教赶出犹太人区而退出的时候,文学依然是高雅人士特别感兴趣的事。由于学校和出版物造就了新的读者,高雅人士的队伍不断壮大,一批有文学修养的读者可以在一个作家刚露头角时便热衷于他,并在其整个文学生涯中支持他。至于小说,依然是社会的写照,法朗士和布尔热的小说着重于上流社会,左拉和自然主义的小说更加大众化。

泰纳和勒南刚死,前者死于 1892 年,后者死于 1893 年。他们所代表的科学理性主义(自 1870 年以来,便略带怀疑与讽刺)开始受到动摇。柏格森和

布特鲁对此有很大影响,有影响的还有已经垂范 15 年的象征派或“颓废派”诗歌。

自然主义已经过时,龚古尔兄弟从未有过真正的读者,莫泊桑被看作是昙花一现的人物,都德依然“如日中天,即使不是孤独无伴,起码也是独立无派”(蒂博代)。米尔博发表了《一个贴身女仆的日记》,夏尔·路易·菲利普发表了《母与子》,科莱特·维里开始发表系列性长篇小说《克洛迪娜》。

左派一边:爱弥尔·左拉、阿纳托尔·法朗士 由德雷福斯事件而涉足政治的爱弥尔·左拉(1840—1902 年)(他发表《我控诉》,被判刑,流亡伦敦)地位提高了,受大赦刚回到巴黎。评论界认为他已经不能再搞文学了,因为三个“城市”(《卢尔德》,1894 年;《罗马》,1896 年;《巴黎》,1898 年)就已经是一部败作,《四福音书》(《繁殖》,1899 年;《劳动》,1901 年;《真理》,1903 年;《正义》,未完成)更是雪上加霜。尽管得到了器重他的布尔热的支持,他依然未能进入法兰西学院,并失去了青年人的支持。直到新一代人才承认《萌芽》和《人形兽》的作者是当代伟大的史诗小说家,在另一部“人间喜剧”的创作中与巴尔扎克相媲美,因为今天《卢贡-马卡尔家族》成了明星之作。

德雷福斯事件的真正胜利者是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年)。

这个贫穷的年轻人——想象力也很贫乏——曾尝试过写诗歌(《金色诗集》，1873年)、剧本(《科林斯的结婚纪念》，1876年)和评论(《文学生涯》，《拉丁神灵》)，后来以他的童年回忆录(《我朋友的书》，1885年；《皮埃尔·诺齐埃尔》，1899年)而获得成功。

《时代》杂志社长阿德里安·埃布拉尔和阿谀奉承的情妇阿尔芒·德·加拉韦夫人克服了他传奇般的迟钝，使他成为“有规律的周期性作家”。他足以与福楼拜(《苔依丝》，1890年)和布尔热(《红百合》，1894年)匹敌。他被接纳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896年)，他写下了得意杰作《现代史话》：《场边榆树》(1897年)、《人体服装模型》(1897年)、《红宝石戒指》(1899年)和《贝日莱先生在巴黎》(1901年)——这一杰作，还有讽刺德雷福斯事件的惹人发笑的《企鹅岛》(1908年)，都依然值得一读。

作者在“看什么都很高兴的大城市马路上看热闹的人的天真中”，加进了一种讽刺、一种玩世不恭的艺术，使那些时代肖像有了一种福兰的速写的味道。

他站在左派一边，将左拉的战斗看成是“人道觉醒的一页”。作为《克兰克比尔事件》(1901年)的作

者，他还是一个怀疑论者，而《诸神渴了》(1912年)则无情地揭示了法国大革命的真相。他写下了《天使的叛乱》(1914年)后便不断获得荣誉，但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超现实主义者在“死后”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24年)，死后在先贤祠举行葬礼。

右派一边：布尔热、巴雷斯 法朗士和左拉在一边……巴雷斯和布尔热在另一边，仿佛是四对舞的舞步。保尔·布尔热(1852—1935年)是资产阶级的伟大小说家。要想回顾1889年与1914年之间的习俗，就必须查看《离婚》、《残酷之谜》、《安德雷·科内利》、《南国的魔鬼》……等一些著作。

布尔热和阿纳托尔·法朗士一样，开始也曾梦想成为一个诗人：

我是一个种族在衰老时出生的人，
在列祖列宗的重压之下，
我的灵魂恼怒而又疲倦，
怜悯之中交织着怀疑。

雄心勃勃的年轻绅士自以为神经有毛病，对人和思想过分好奇，以致于害人的春药对他也不起作用。正确的评价是——如同《当代心理学论文集》所指出的那样——运气(可能是恶运)造就了他的第一

批小说(《残酷之谜》、《爱之罪》、《谎言》)。《门徒》(1899年)使他37岁时成了名。和斯汤达写《红与黑》一样,他根据一则社会新闻写下了这部小说,画出了一幅泰纳原谅门徒的讽刺肖像。

他和巴雷斯一样,信仰国家主义,写下《国际都市》后一直坚持主题小说。《阶段》、《离婚》、《南国的魔鬼》……有多少有关保守论点、伦理道德和国家制度的辩护词,就有多少论证逻辑很强、但主人公缺乏想象并失去本能的小说。

布尔热的寿命很长,每年都写小说,一直写到去世(1935年)——却没有发现他所描写的社会已经去世——我们必须知道,他一生中除了一些已经变得荒谬的小说外(如《阶段》或《流亡者》),还写了一些出色的小说,如:再现亨利·詹姆斯的《国际都市》和因对现代主义的批判而留传后世的《南国的魔鬼》。

右派的伟大人物是莫里斯·巴雷斯(1862—1923年),他是一个迷失方向的天才,练就了夏多布里昂以来法国散文中人们所见到的最优秀的笔法。挽救他的正是他的文笔,在三部曲《自我崇拜》中是讽刺的和斯汤达式的文笔,在三部曲《民族精力的小说》(《离乡背井的人们》;《对战士的号召》,1900年;《他们的嘴脸》,1902年)则表现为感情的流露和热情的

激发。他的主题小说(《柯丽特·波多什》，1909年)——而不是他那音乐般的作品(《鲜血、快感和死亡》，1894年；《格雷科或多莱德的秘密》，1911年)——已经过时。

与法朗士和布尔热相反，作为《一个自由人》的作者，他留下了许多信徒(莱昂·勃鲁姆、雅克·里维埃尔、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对那些像阿拉贡与蒙泰朗、马尔罗与德里厄·拉罗谢尔那样互为迥异的人也产生了影响。《我们中间的巴雷斯》(1952年)——袖珍书中他的作品那一段——中所汇集的见证说明了一个被看作还在“炼狱”中的作家的不朽形象。

异国情调、色情变态：皮埃尔·洛蒂、皮埃尔·卢维、克洛德·法雷尔 一方的法朗士和左拉及另一方的巴雷斯和布尔热在1900年左右努力尝试将文学卷入社会活动的时候，《菊子夫人》(1887年)和《幻想破灭者》(1906年)的作者皮埃尔·洛蒂(1850—1923年)等人却并不关心。洛蒂可能曾是读者最多的小说家，最著名的小说家，引起读者——尤其是女读者——幻想的小说家。在环球旅行还很稀罕的时代，他已经了解了塔希提岛、君士坦丁堡、古老的中国、封建武士的日本、总督统治的埃及、封建的摩洛哥和黑楼成群的北部湾。《拉门肖》和《幻想破灭者》

轰动全球以前,《冰岛渔夫》(1866年)和《我的兄弟伊夫》早就使他赢得了读者,可能对写在绢帕上的故事流露出来的忧伤比对已经显示出荒谬感觉的痛苦更加敏感。洛蒂曾说过:“人们将在我的书中发现我过去的一切,我痛惜过的一切,我热爱过的一切。”

作为《菊子夫人》的作者,他着实风行过一阵后,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但是,今天我们上了多少并不比他戴着面纱的假夫人更有魅力的弄虚作假者的当呢?”(保尔·居特)

皮埃尔·卢维(1870—1925年)仍然不失为20世纪和平幸福的头20年的象征,但是由于一些说不清的原因,他的荣誉还是显得更为脆弱。

他是安德烈·纪德和保尔·瓦莱里青年时代的朋友,在他们两人还没有“出道”的时候,他就以《比利蒂斯之歌》(1894年)和异教小说《阿弗洛狄特》(1896年)而闻名。(他创办了《海螺号》杂志,给他们创造了机会,也给普鲁斯特创造了机会。)他还写了一些优秀的小说,如:《妇人与傀儡》(1898年)和《波索尔王传奇》(1901年),以及一些不能完全被忽视的短篇小说。但他后来沉沦于放荡的生活之中,直到变得半瞎和迟钝时才醒悟过来。

他的两位内弟——和他一样,是埃雷迪亚的女婿——几乎没有得到更多的运气。今天谁还看莫里